

理解南宋历史的一把钥匙

河北大学 廖寅



真德秀(1178—1235),晚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一生致力于光大朱子学说,在理学官学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近读上海师范大学孔妮妮所著《真德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11),收获良多。旁观晚宋,颇有拨云见日之感。一般的人物研究,多是以时间为轴线铺陈主人公的生平事迹,《真德秀研究》则是以问题为中心讨论南宋时代的核心议题。目前的史学研究,流行从小人物看大历史。从小人物看大历史,只能算是一种“遥望”。透过历史名人观时代风云,则有“身临其境”之感。晚宋时期,理学官学化与社会化、国是之争与多民族互动、居乡士人与地方治理、文道观的演进与文学的流变,都是具有时代性的热点议题。真德秀不仅深度参与了这些议题,而且是部分议题的引领者。鉴于学界对南宋史的研究相对薄弱,《真德秀研究》可以说是理解南宋历史的一把钥匙。

关于君臣之学的阐释颇有新意

南宋政治最大的新变是理学成为官学,启皇帝与大臣循理治国。该著所阐释的帝王之学、辅臣之学、守牧之学体现了南宋理学家对治国理政的宏大建构。

真德秀进献给宋理宗的《大学衍义》建构了帝王之学的经典范式,其目的在于为君主治

国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受到了宋理宗的嘉许,认为其有补治道而朝夕观览。相比帝王之学,宋代的辅臣之学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本书在论述辅臣之学上贡献良多。真德秀以正己、格君为体,谋国、荐贤为用,考论古今辅相事业,通过对君臣之道的讲论与践行,使君臣互相警发,有益益于政。帝王循道治国,辅臣循道佐君,则君臣契合、天下大治。辅臣之学贵在明体达用,彰显君臣道合的经世意义。辅臣之学针对宰辅重臣,地方官员则有守牧之学。真德秀著有《心经》《政经》,从儒家经典和理学诸子的论述中辑取了大量省察存养、去欲主敬的“治心”格言,总结了古代循吏的治邑经验,将理学家的心性之说与修己治民之法融为一体。在《真德秀研究》中,作者首次整合《心经》《政经》,提炼出真德秀对守牧之学的构想,令人耳目一新。使《心经》为体,《政经》为用,构成了守牧之学的经纬之脉。

对南宋史核心议题的论述有一定深广度

本书以真德秀为切入点进行多角度探析。从朝廷到地方,作者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议题进行了开掘,呈现出晚宋士大夫政治的发展趋势和理学社会化的演进方向。

通过剖析真德秀制诏与奏议书写背后的政治博弈,该著探索宋代政治语境研究的新路

径,深化对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理解和认识。以礼化俗、推行礼教是理学社会化的重要特征。作者关注到理学家在尊重民间信仰与推行礼教之间的多方平衡及其对民间信仰的引导和改造,并通过这种平衡过程的分析阐释,展现出南宋后期理学世俗化的社会趋势。作为牧民官,真德秀注重平衡礼法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在尊重地方传统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对民俗加以引导、改造;作为一代大儒,真德秀以礼教规范民众行为,从民众道德观的培养到乡规民约的推行都被囊括其中,彰显了理学家淳风化俗的社会理想。南宋后期,理学家秉承“苟可为民,予敢弗共”的地方治理主张,在尊重民愿的基础上推行化民成俗的各项措施,使礼法制度和乡规民约等基层社会行为准则逐渐为民众所接受,对宋以后的历代王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理学家文道观的论述有时代性和典型性

南宋中晚期是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又一次高潮期,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真德秀虽然不以诗文创作闻名,却以“明义理、切世用”的文道观为文坛提出了创作的正宗范式。

真德秀七岁能文,开禧元年(1205)中博学宏词科,其所制诏引经据典,醇厚温雅,被赞为词臣典范。随着理学成为官学,程朱学说也成

为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内容。举子作文多尚性理,必引《四书》《语录》等,方可擢巍科、为名士,“否则立身如温国,文章气节如坡仙,亦非本色也”。继承了北宋诸子与朱熹的文道观,真德秀重义理而轻文辞,却反对义理在文章中的形式主义体现,倡导明义理、切世用,发挥文章经世致用的功能。为了提升士人的道德修养,扭转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创作风尚,真德秀编纂了《文章正宗》《续文章正宗》,前者收录前代“正宗”文章,后者收录当代“正宗”文章,为士人提供承载价值观的典范文本。历经宋、元、明、清四朝,《文章正宗》成为士子作文的正宗范式,在全国广为流传,甚至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天下后世之欲为文,未有不由之者。匪是悉邪也,不可以为宗也”。

要言之,《真德秀研究》是首次对真德秀的整体研究。作者不倾向于将真德秀的思想和著述当作封闭的个体,而是在理学演进与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中考量真德秀的地位和作用,展现理学在晚宋时期的多元趋势和复杂特征,避免研究中所存在的表象化、片段化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真德秀研究之不足。作者以个案研究探索南宋历史,剖析了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军事、社会、思想问题,以较为宏阔的视角展现了理学影响下的南宋社会向“近世化”转型的趋势,突破了原有的研究窠臼,是个案研究中的新开拓。

“找回国家”

北京外国语大学 宋亦明



在社会中心主义范式如日中天的时代,西达·斯考切波等高呼着“找回国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在比较政治学领域掀起了令人激动的国家主义研究浪潮。而在国际投资的政治经济学领域,陈兆源博士的新晋研究《投资国家能力:外国直接投资结构与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建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1,以下简称《投资国家能力》)同样试图在“找回国家”。

两个方面的进展

这一努力至少在两个方面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展。

就经济/政治-国际/国内的解释而言,《投资国家能力》找回了作为因变量的国家。相较于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分别探讨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国际政治与国内经济关系的开放经济政治学迅速占据了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流。仅就前者而言,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国内政治基础,因而以国内政治因素为自变量,以国际经济因素为因变量的成果卷帙浩繁。相比之下,《投资国家能力》则在对国际投资的研究中首次将国家能力作为因变量,在该领域研究中另辟蹊径地开创了以国际经济因素为自变量、以国内政治因素为因变量的解释方向,进而有助于拓宽该领域的研究思路与议题空间。

就国际投资研究的学科生态位(disciplinary ecological niche)而言,《投资国家能力》找回了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得益于研究方法的数理转向、研究设计的较早引入,以及研究对象更可行的操作化等优势,经济学在实证分析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并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异军突起。在国际投资领域,经济学研究同样毫无疑问地牢牢占据了其学术高地。尽管这些研究也会触及国家以及与国家相关的变量,但相关研究不仅对国家的讨论往往着墨有限,更鲜有揭示国家与投资关系的底层政治逻辑。作为一项政治科学的研究,《投资国家能力》对国家能力及其多个维度进行了大量的探讨,着重发掘了外资结构影响国家能力的规律。这一努力,无异于在经济学的优势领地上鲜明地亮出了政治学的旗帜,并且提醒该领域的后续经济学研究不要轻易地忽视国家及其政治逻辑。

具体而言,《投资国家能力》回答了外国直接投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是否会影响到发展中东道国国家能力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的问题。该研究通过构建一个欧几里得式空间模型,阐释了外国直接投资结构影响东道国国家能力建设的主要方向和过程机制。其核心理论观点或研究结论是,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的多元化将有助于发展中东道国提升国家能力,中国投资

者在外资结构中所占比例的提高将有助于发展中东道国进行国家建设。从研究方法来看,该著是一项典型的实证研究成果,该研究在混合研究设计的指导下,同时运用定量实证和案例实证两种方式,使二者得以互补长短,兼顾了问题解释的广度和深度。从现实教益来看,它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积极意义提供新的学理支撑,也可以为更稳健地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供一些政策启示。

精彩之处

作为一本扎实的学术专著,《投资国家能力》具有诸多值得品鉴的精彩之处。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及其相关变量本身还可能引发读者的进一步思考与联想。

第一,虽然该模型已将东道国和外国投资者“赢集”如何随着投资者数量与类型的变化而发生变动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但在“被符号化”的背后,外国投资者或跨国企业是如何与东道国进行博弈并改变东道国的国家能力的,尚难以通过形式模型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这个角度看,该研究还可能为后来者进一步开展关于跨国企业行为及其结果的研究奠定基础或提供选题思路。

第二,对侧重于关注国家能力建设的读者而言,该研究还可能激发他们对不同解释变量进行比较的兴趣,具体包括外国直接投资结构以及其他影响国家能力的变量解释力的大小,以及各解释变量在影响国家能力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会相互影响等问题。

第三,国家能力建设是一个与国家相伴相生的永恒话题,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或规律是否或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应用至发达东道国中,这也是在该研究的基础上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任何研究都绝非完美的研究,《投资国家能力》虽为白璧但也难免微瑕。譬如,相较于最大相似设计下的比较研究,对于埃塞俄比亚的单个案例研究无疑在检视因果机制上稍显单薄。再如,考虑到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关联性,在回归分析中讨论国家能力时前者仍不应被简单忽视。即便如此,相较于其学术贡献,上述问题终归瑕不掩瑜,因而该研究被收录进在国际国际关系学界享有盛誉的“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在国际投资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低垂的果实”早已被摘取,但诚如该著所印证的那样,该领域仍如同一个学术富矿,等待进一步的开拓与探索。

1959年10月21日,傅雷在给他的儿媳、傅聪的妻子弥拉的英文信件中这样说:“看来,你对文学已有相当修养,不必再需任何指导,我只想推荐几本书,望你看后能从中汲取教益,尤其在人生艺术方面,有所提高。”他所推荐的几种提高人生艺术的书,有法国作家莫罗阿的《恋爱与牺牲》和《人生五大问题》,这都是他翻译过的。近日出版的《人生问题与幸福之路》(上海远东出版社,2023.6),是由傅雷翻译的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和英国学者罗素的《幸福之路》两本书合集而成。傅雷翻译的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原著出版于1934年,傅译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罗素的《幸福之路》原著出版于1930年,傅译于1947年由南国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所讨论的都是些看上去“大而无边”,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却须臾不可离开的五个问题:婚姻、父母与子女、友谊、政治机构与经济机构、幸福。

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丧偶式”的婚姻?如何看待“不婚族”,以及一些前所未见的婚姻形态?如何看待那些不生孩子“要潇洒”的“丁克族”?如何看待生育危机?怎样搞好亲子关系?为什么我们手机里有那么多“联系人”,却没有几个可以说得上三句话以上的朋友?为什么我们身边的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为什么会有人走上“不归路”?到底需不需要民营经济?民主制度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吗?……

面对这些人生问题,莫罗阿与罗素探讨的方式、风格各异。莫罗阿凭借其丰富的知识、严谨的分析、深邃的思想,对这些问题抽丝剥茧,寻根究底。罗素则自称“既无高深的哲理,又无渊博的征引”,只是将平情之道理加以归纳,并经由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加以验证,确认行之有效。如果说他们的“老生常谈”是“一杯醇酒”的话,那他们的“真

如何提高人生的艺术

上海社会科学院 陈占彪

知灼见”有如“一根辣条”。他们的著作是疗治这个时代“精神疾病”的“一剂药石”,也是对误入歧路,甚至走上穷途的人们的“当头棒喝”。

比如,罗素和莫罗阿都不约而同地讨论了什么样的因素使得人生不幸福,并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谋得人生的幸福。致使不幸的有实在的灾祸、疾病、贫困和失败等因素,也有精神上的烦闷与兴奋、嫉妒、犯罪意识、畏惧舆论等因素。

莫罗阿就提到精神上的、想象中的痛苦,这是一种人造的不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杞人忧天”。“一件灾祸未曾临到的形象,比着灾祸本身更加骇人,故恐怖的痛苦格外强烈,且亦更其无聊。疾病是残酷的;但看见别人患病而引起我们的害怕更残酷。”这种情形的确很多,比如:孩子担心父母将来可能死亡;看到别人的不幸而感同身受,由此担忧这种不幸会朝一日降临在自己的身上;想到未来会面临种种想象中的挫折和失败。而这种想象中的痛苦比实际所承受的痛苦更为痛苦。“人生本身已经够苦了,为何还要加之虚妄的惨痛的预感呢?”因此,莫罗阿在幸福的秘诀中就让我们“不要想象那些遥远的无可预料的灾祸以自苦”。

又如,关于父母和子女的冲突,莫罗阿认为,父母和子女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主要是做父母的一味将他们曾经从亲身经历中所得来经验强加于未经世事的孩子的头上。他认为经验只能从失败中、痛苦中得出,是要切身体会的。因此,经验几乎是不能传授的。“经验的唯一价值,因为它是



痛苦的结果,为了痛苦,经验在肉体上留下了痕迹,由此,把思想也转变了。这是实际政治家的失眠的长夜,和现实的苦斗;那末试问他怎么能把此种经验传授给一个以为毫不费力便可改造世界的青年理想家呢?一个成年人又怎么能使青年容受‘爱情是虚幻的’这种说法呢?”

正因为经验的“不可传授性”,就会看到青年的反抗,成人的失望,于是矛盾和冲突就发生了。基于此,他要求父母能够设身处地地想想当初自己还是青年时的状况,避免因此而伤害孩子的思想、情操和性情。

指导人生须切实。罗素称中庸之道是一种“乏味的学说”,“但在许多方面是真理”。这本书的一些观点平实公允,不偏不倚,可以说是“中庸之论”,亦可以说是“真理”。

时代在变,但是婚姻、家庭、友谊、幸福等人生问题永远不变。莫罗阿和罗素关于这些问题的精彩而切实的议论,对我们来说,有如“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因此,与其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不如平心静气、驻足阅读。

民间的走向与历史的转向

天津作家协会 祁泽宇



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其中便对“宋元变革论”的微妙洞悉,换言之,“宋朝或者更后”士人走向民间带动文化转型。在作者看来,宋代科举造就了一批高官显宦,而它背后则是更多的潦倒士人,南宋一朝,有幸通过科举的世人在仕途上依然艰难,这本书用“立着的葫芦”形容士人的处境,成千上万的举子拥堵在葫芦的下层,当他们从狭窄的空间突围后却又拥堵在葫芦的上层,于是他们又要冲破新的瓶颈,新的突破难于登天。“内举不避亲”《小官僚大投射》《写意黄公望》等文通过观察南宋时期科举改官施行,陈明这一过程中士人与朝廷之间逐渐产生疏离,金字塔的顶端金碧辉煌,能攀登上去的则寥寥无几。朱自清所言的“雅俗共赏”,源自那个时代士人上层路线所阻碍转向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这对经历了失败失意失望的士人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近世始于南宋”

与内藤湖南等人所声张不同的是,作者将历史转变的焦点由中唐转向南宋,他主张“从南宋历元,跟明清,乃至近代的联系来观察得出的认识。观察的矢向不同。靖康之变,北宋遽然灭亡。突然的巨变,政治场的位移,开启了下一个变革……这一变革,由南宋开始,贯穿有元一代,开启了中国历史走向近代的滥觞”。这项完成于元代的变革,为战乱时期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南埋下了历史转型的种子。

朱自清在《论雅俗共赏》里谈到“似乎雅人多

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其中便对“宋元变革论”的微妙洞悉,换言之,“宋朝或者更后”士人走向民间带动文化转型。在作者看来,宋代科举造就了一批高官显宦,而它背后则是更多的潦倒士人,南宋一朝,有幸通过科举的世人在仕途上依然艰难,这本书用“立着的葫芦”形容士人的处境,成千上万的举子拥堵在葫芦的下层,当他们从狭窄的空间突围后却又拥堵在葫芦的上层,于是他们又要冲破新的瓶颈,新的突破难于登天。“内举不避亲”《小官僚大投射》《写意黄公望》等文通过观察南宋时期科举改官施行,陈明这一过程中士人与朝廷之间逐渐产生疏离,金字塔的顶端金碧辉煌,能攀登上去的则寥寥无几。朱自清所言的“雅俗共赏”,源自那个时代士人上层路线所阻碍转向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这对经历了失败失意失望的士人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传统中国走向近代的精神力量之源

《士人走向民间》提出,由北宋精英政治到南宋的民间主宰,流向多元的士人们在乡为民,入仕则官,他们立足地方也胸怀天下,他们远离政治是为了伺机待价而沽,时代的价值取向体现出家

天下的意涵。随着赋闲乡居的官僚士人越来越多,社会也悄然发生转型。士人们在艺术的天空中自由翱翔(黄公望),突破了男女大防的性别阻碍(管道升),甚至产生了“读书不求官”的价值取向(苏轼),以上种种都显示出具有近代因素的萌芽正在兴起。

作者认为地方社会的崛起是宋元时代变革的重要标尺,宋元士人“知难而退,在繁荣的地域社会寻求出路”,开始服务地方、发展地方。同时,在地方逐渐积累影响力的民间士人也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通过开办私学,自身节操影响民间风俗。活跃在乡间的民间士人生存于地方,经营于地方,人际网络也构筑于地方,成为传统中国走向近代的精神力量之源。

该著全面展示了时代发展态势,例如理学如何成为国家正统的过程。其中,士人提供的“民间力量”正是从主流压制到民间接受的中间力量,以道化俗的理想不会因朝代更迭而改变,也不会因为政权更替而消亡,相反在民间儒学的道路能走得久远。《大学》所提出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南宋以降真正实现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统一。可以发现,宋元时期政治钳制的松弛恰是思想繁盛的前兆,社会需求推动着文化下移,士大夫的政治繁花在社会结果,他们在民间受到了礼待,他们对民间的精神构建也超越了王朝因素。正是南宋以来民间的地域文化指向,庙堂与民间其乐不殆,华夏文化造极于一时,后世有了深入骨髓的理论自信。

历史是不中断的流逝,“宋元变革论”所蕴含的现代性之肇始,是政治因素逐渐减弱,经济文化因素逐渐成为主导的过程,地方社会的转型也就成为时代发展推手,置于特定的时代,《士人走向民间》超越地域社会史,无所遁形地陷入曲折多变的历史浪潮中,全方位展现中国历史之走向。

社科书讯

《市场给不了的自由》,[美]迈克·孔加尔著,舍其译,译文出版社,2023.8

是否应该让自由市场决定人们的生活?美国著名经济评论员迈克·孔加尔以响亮的否定回答了这一问题。孔加尔指出,在美国人珍视的诸多自由中,有很多是市场给予不了的。事实上,人得以生存的一些基本资源,比如土地、劳动力和时间,恰恰是不能完全市场化的。



《迈向产业强国: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与政策》,魏刚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23.6

本书全面总结中国产业政策的演变与经验,系统梳理产业中长期发展战略,集中提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在全球变局中把握产业强国建设新机遇、厘清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逻辑。



《审美的脑神经机制研究》,胡俊著,人民出版社,2022.12.

神经美学是一门新兴前沿性交叉学科,秉持认知神经科学与美学的融合方法,已取得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新进展及实验新成果,日益兴盛的审美神经机制研究为美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本书系统介绍和阐述了神经美学学科的研究现状、新科学方法,及其视听觉等方面研究成果,把神经美学研究与当代美学发展所关注的基本理论问题相融合,并展望神经美学的未来发展路径和愿景。

